

# 民初之知識份子(1912—1928)

蘇 雲 峯\*

## 摘 要

大家都知道「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中的一件大事，它所涉及的範圍很廣，包括思想、文化、政治、社會與教育等層面。可以說是一個震撼時代的運動。它的領導者是知識份子。中國傳統的讀書人一向安份守己，雖然在歷代也有過各種運動，總不像民初的知識份子那麼強勁有力，何以致此？是值得深究的問題。目前已有許多很好很成熟的研究，但各有立場。本文擬從歷史及社會學的觀點與方法，從知識份子結構轉變、家庭背景、地理分佈、價值變遷及功能角色等方面去一一加以敘述與分析，期望獲得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及變遷的基本原因與歷史意義。

在知識份子之教育結構方面，已由「舊士紳」、「新士紳」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轉變到以新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陣容。在年齡結構上，以1880 科夥 ( Cohort ) 及 1890 科夥為主導力量。在知識份子之出身方面，以商人、官僚、教職員及地主為絕對多數，工人及一般貧下中農，尚難有晉升的機會。知識份子多集中于少數大城市，是過去沒有的現象，其原因與經濟、教育之偏倚發展及政治社會不安有密切關係。知識份子之價值觀念亦發生很大轉變，由清末之技術、制度取向，到民初之思想理念取向。可是這一劇烈轉變，超越了對應的社會物質基礎，而發生了理想與現實的強烈衝突，並引起衆多的問題。本文將有詳細的分析。至知識份子的功能及角色問題，人言各殊，本文從政治、教育、學術與文學等面逐項檢討，以求得一客觀平衡的結論。最後，提出一個理想的「知識份子階層模型」，但並不以之評鑑過去，而是以之策勵將來。

## 一、緒 論

關於知識份子 ( intellectual ) 一詞，社會學家尚無一致的界說，因其於不同的社會及不同的時代，均有不同的含義。在中國傳統社會裡，知識份子的界綫比較容易確定，但自受西方文化衝擊以後，內涵逐漸複雜化，即在民初已不易寫出一個完整的界說。然而爲了敘述及討論的方便，不得不綜合諸家之說，加上個人的思辨所得，從民初知識份子之主要特徵、工作型態、社會功能及價值取向等方面，廣泛地界定如下：

(一) 擁有知識，能運用文字或符號表達思想意見者。彼等知識之來源，爲一定程度的學習與教育。在清代爲生員以上的士紳；在民初則爲受過中等學校以上教育，或同等程度的人。

(二) 在工作型態與職業結構方面，知識份子所從事者，爲勞心工作 ( mental work )，而非勞力工作。在職業結構上，屬於思想、哲學、科學、教育、文化藝術與自由職業。換言之，他們的工作，主要與追求、使用及傳播知識有關，是經常

使用精緻文化的人。

(三)在社會功能方面，他們並不直接創造財富，或保衛國家安全。而在保存、累積、修飾、再製、詮釋、創造與傳播文化知識。這是非常複雜而艱巨的工作，絕非一人所全能，故他們之間非分工不可，而構成前述之不同職業。

(四)在思想態度上，知識份子一般較重視價值觀念，但由於所擁有之知識性質與程度不同，而發生思想與價值觀念之歧異。他們之中，有些人較有獨立自主精神，富有創造力，並不斷追求新觀念，是知識份子中的先驅人物。但另一部份人則較偏向依賴與保守，反對創新與變革，甚至消極冷漠。在先驅知識份子中；有一些人作了過激的反應，導致理想與現實的衝突，於是，傾向不滿現狀，甚至要推翻現狀，以實現理想。此種表現不以政治、經濟層面為限，亦包括哲學思想、科學、文學與藝術。不過，有此傾向者，在任何歷史事件中，均屬少數。事實上，知識份子分散於各種不同職業、政治團體與不同的價值結構之中，思想及力量並非一致，且往往是互相對消的。<sup>〔註一〕</sup>簡言之，知識份子在思想譜系上可分為下列四個類型：冷漠、保守、改革與革命。四者之間的結構關係，並非固定不變，而是互相流通的。其流動方向大致是：在承平時代，一般傾向保守；在社會動亂時代，或受異質文化挑釁時，有一部份人傾向保守，而另一部份人傾向改革。改革不遂，或轉向冷漠，或轉向革命。若革命遭挫折，則轉向偏激，或轉向冷漠。但冷漠與革命之間，僅一綫之隔。因此，也不能排除由冷漠再度躍出，從事于改革或革命的可能。總之，人是理性與感情的動物，二者之結合變化多端，很難有一定的鐵則。當然，就人類社會長期發展的目標而言，不斷批評、創新、變革與關懷社會為最珍貴的品質。因此，有一些社會學家及政治改革者，就將缺乏社會關懷與批評的人排除于知識份子門戶之外。本文不採取這種極端的劃分標準，否則街頭政治家都成了知識份子，而專心從事學術及科學研究者，反而不是了。

## 二、結構之改變

隨着政治、經濟及教育制度之變革，民初知識階層結構也發生重大之轉變。自清末起，傳統「士紳」中已有一部份人經由再教育的途徑，轉變成為「新士紳」，扮演了「邊際人知識份子」( marginalman intellectual ) 的角色。所謂邊際人知識份子，係指「處在邊際情境的知識份子」，即處在新舊二種文化之間，發生了內心認同危機的人。如果調適得當，則是新文明誕生的主力軍，但如果為了解脫自我困境而放棄母文化，認同于異質文化，便會發生前述的外在衝突。〔宋明順，1974：234〕。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以後，新一代的知識份子始告誕生，至民國建元後，此一新知識份子之陣營愈加壯大，使整個知識階層之結構重心，由「舊士紳」與「新士紳」，轉向新知識份子群。據周策縱的估計，於1917年時，中國社會中多少受些新式教育的人，約有一千萬之衆。〔Chou Tse-tsung 1960：379-80〕但依照本文的知識份子界說，則接受中等以上教育及同等學力者，不及半數。據民初教育資料估計，於1916年時，全國各級學校教職員及學生合計，最多不超過4百50萬人，加上1905～1911年的各級學校師生15～20萬人，不過4百70萬。其中，符合本文界說之第一條件者，為數更少。但教育之發展，不因內戰而停止，受中等以上教育及留學人數，續有增加。故于1927年以前，累計最少五、六百萬人，連同新舊士紳，也有六、七百萬人之多。從橫切面剖析，民初知識階層主要由下列三種人物構成，其比重與清季有所不同。

(一)清季餘留下來的「舊士紳」與「新士紳」，共約70～80萬人。但這是一個封閉群，年齡漸大，人數漸減。其中，1870年代，及1880年代出生的一群，在政治、經濟與文教等方面，均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1880年代的一組。

(二)民國元年以後之各級學校教職員及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人數逐年增加，自1912年之38萬餘人，至1929年之82萬餘人。其中，教職員人數比學生為多，其比例平均為64%對36%，如表一所示。在教職員中，又以小學教職員人數最多

表一 民初各級教職員及中等以上學生人數

年 份	各級教職員	%	中等學校以上學生	%	合 計
1912	227,006	60	154,168	40	381,174
1913	285,083	64	162,682	36	447,765
1914	309,525	66	160,261	34	469,786
1915	327,765	68	156,444	32	484,209
1916	310,366	70	135,012	30	445,378
1928			260,008		
1929	455,925	55	370,145	45	826,070
1930	618,362	53	546,970	47	1,165,332

資料來源：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1934），丙編，頁14-15，23-25，145-146，155，194-195，311，375，423；丁編，頁60；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來主要事業之進步（1935），頁30-31。

，中學次之，大專最少。但從功能及角色看，則反之。學生中也以中等學校學生為最多，專科學校次之，大學生最少。但大學生與專科學生之人數逐年變化，即專科生遞減，大學生遞增。

(三)留學生約數萬人，分佈於各種職業中，惟以政界與教育文化界為主，故與第一、二組均有相當大的重複。不過為了討論方便而特別標出。留學生中，1917年以前以留日學生為最多，1921年以後，改以留美學生為主，至留歐學生，則始終居第三位。留學生是最典型的邊際人知識份子，故其功能與角色，非常重要。

總之，知識份子的人數，愈來愈多，即令在全人口中僅佔極少的比率，但依舊是重要的一個階層。其內部結構重心，如上所述，也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這些改變所帶來的問題，將在後面介紹價值變遷時深入討論與分析。

在年齡結構方面，作者採用科夥分析（Cohort analysis）的方法。所謂科夥（Cohort），狹義的解釋，指某一社會中同一時期出生的一群人而言。由於彼等

有共同的機會經歷生命史上若干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而產生近似的感情與價值觀念。（王湘雲，1981：5-6）茲依此定義，將民初知識份子分爲五組科夥：（一）1860年代出生組，（二）1870年代出生組，（三）1880年代出生組，（四）1890年代出生組，（五）1900年代出生組。然後，再看他們在下列三個重要時期的年齡結構，即（一）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二）1919年五四運動，（三）1927年的北伐統一。（見下表二）。發現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三、四組。第二組接受完整的舊式教育，但也接受一些新教育，如梁啟超（1873）、王國維（1877）、陳獨秀（1879）、黃炎培（1879）等是，然彼等於上述後二個重要時刻，漸由壯年進入老年階段，多數人在思想態度上，轉趨保守。第三組1880年科夥，也受到完整的舊式教育，而於1905年廢科舉時，正是16～25歲的青年，有學習新知識的潛力與機會，而於五四時進入壯年階段，北伐時爲人生成熟的階段，如周樹人（即魯迅，1881）、馬寅初（1882）、沈尹默（1882）、江亢虎（1883）、蔣夢麟（1884）、賈士毅（1886）、董顯光（1887）、陳寅恪（1887）、丁文江（1887）、陶孟和（1887）、李四光（1889）等人。這一夥人在各種行業中均居於領導地位。第四組1890年科夥，沒有傳統功名，而在五四時期，正值中學至大學階段，少數人當了教授。這是思想較激進的一群，也是五四運動的先鋒。在政治、教育、社會改革與文學革命中，均居重要地位。如胡適（1891）、傅斯年（1896）、羅家倫（1895）、陳達（1892）、竺可楨（1890）、翁文灝（1891）、吳有訓（1897）、梅貽琦（1890）、梁漱溟（1893）、晏陽初（1894）、陶行知（1892）、徐志摩（1895）、林語堂（1895）、沈雁冰（茅盾，1896）、朱自清（1896）、郁達夫（1896）等等，不勝枚舉。至第五組1900年科夥，在五四時期爲年尚幼，至北伐時期，始成爲政治激進運動的群眾基礎，他們的成就，多在北伐統一以後，若干人迄今尚存，此處不列名單。下面是民初知識份子在重要歷史事件中的年齡結構：

表二 民初知識份子在重要歷史事件中的年齡結構

組 別	出生年代	1905 時 歲 數	1919 時 歲 數	1927 時 歲 數
1	1860	36~45	50~59	58~67
2	1870	26~35	40~49	48~57
3	1880	16~25	30~39	38~47
4	1890	6~15	20~29	28~37
5	1900	0~5	10~19	18~27

說 明：在黑圈中的第3、4組科夥，是在五四運動時期扮演重要角色的二組。

### 三、出身背景與地理分佈

#### (一) 知識份子之出身

民初知識份子，絕大部份來自商人、官吏、教職員、自由業者及地主家庭。來自農工家庭者必然很少。中學校多數設立於縣城及省市，而大專學校則較集中於北京與上海等少數大城市。交通、學雜及生活等費，需要相當多的金錢，於1930年時，在上海讀書的中學生每年需150元，大學生平均需693元，在較早時也需五百元左右。〔Wang, 1966: 152-3; 多賀, 1976: 下1163〕而在這時期的工人工資收入，較好的工頭及交通運輸工人，每年不過二、三百元，一般工人所得不足百餘元；僱農則在20~80元之間。〔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 1928: 編1〕此種收入水平，維持家庭開銷尚嫌不足，鮮有餘力供子弟就讀中等以上學校。所以李璜說，「以四川而論，能讀書至中學畢業之子弟，其家非商人即地主；絕少赤貧之家而能栽培兒女至中學畢業者」。〔1978: 70-71〕在華中地區，情形相同，即擁有土地30畝之地主，始可供應二個子弟就讀初等小學；50畝地主才能供一個子弟讀高等小學；須有地二百畝，才可每年提供150元支持一子念初中。〔Wang, 1966: 153〕

在北方的定縣，情況稍好些，即有地 30 畝者可送一子弟讀高小，50 畝以上可供一人讀中學，百畝以上可供一人讀大學，10 頃以上，才可供一人留學〔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1927：487〕。中國人口衆多，而耕地有限，土地分配雖不均，但擁有二百畝以上的人屬於少數。據 1920 年代的調查，全國有 0.2%~1.6% 的農家，每年收入在 2,000~5,000 元之間；而僅有 0.2%~0.4% 的農家，年收入在 5,000 元以上。〔Wang,1966：153〕可見農村中，能支持子弟受中等以上教育的除較大的地主外，自耕農以下都很少。工人階層更爲困難。當然，任何時代都有出身寒微的才俊之士，但畢竟是少數。

至留學生的費用，更非一般家庭所能負擔。中國之派遣留學，始於清季，由官費而擴及自費。但於清季，官費尚多。1917 年以後，由於政事紛紜，官費劇減，而自費劇增。且留學重心，由費用較少之日本，轉向費用較多之美國。據最近出版的教育部檔案資料，在 1919~1927 年登記出國的留學生 1,194 人中，官費生最多時不過 34%，而自費生則在 66%~100% 之間，如下表所示：

表三 民初官、自費留學生百分比

年 份	人 數	官 費 ( % )	自 費 ( % )
1918	32	28	72
1919	115	18	82
1920	210	20	80
1921	30	0	100
1922	85	34	66
1923	59	0	100
1924	292	2	98
1925	105	20	80
1926	124	0	100
1927	108	0	100
合 計	1,194	14	86

資料來源：王煥琛編，留學教育，冊 3，頁 1559-1659。



另據一項較長期的統計，於 1905 ~ 1942 年的留學官、自費學生比例，也發生強烈的對比，如下表四所示：

表四 留美官、自費學生百分比

年 份	官 費 生	自 費 生
1905	61	39
1910	32	68
1925	20	80
1929 ~ 35	19	81
1942	3	97

資料來源：Chow Yung-teh,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p. 39.

留日與留歐的情形，也發生同樣的變化。總之，民國成立以後，留學生依賴家庭經濟援助的比重，愈來愈大。所以除了 1919 ~ 1922 年勤工儉學留法學生二千人，是一群不滿家庭（商人、地主居多）現狀，而負氣出國求學的所謂窮學生外〔李璜，1978：55-73〕，絕大部份，都來自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與家庭。

就各種不同的調查統計，歷年官、自費留學生以江蘇、浙江與廣東三省為最多，其他沿海、沿江省份次之〔Wang, 1966：157-159, 160-1〕。如下列留美、歐、日三表所示。

表五 留美學生籍貫百分比

省 別	時間 %	1921 ~ 1934	1854 ~ 1953
		江 蘇	24.9
浙 江		12.8	5.0
廣 東		12.8	15.3
其 他 合 計		49.5	50.4
總 計		100.0	100.0

資料來源：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p. 157.

表六 留歐學生籍貫百分比(1902~1930)

省	別	百 分 比
江	蘇	25.7
浙	江	16.1
廣	東	11.0
福	建	8.4
四	川	8.0
其 他	合 計	30.8
總	計	100.0

資料來源：同上書，p. 159。

表七 留日學生籍貫統計(1913~1930)

(總人數：7,373人)

省	別	平 均 百 分 比
廣	東	16.1
遼	寧	12.0
湖	南	9.6
江	西	9.2
浙	江	7.4
湖	北	7.0
福	建	6.4
四	川	6.4
江	蘇	4.5
其 他	合 計	21.4
總	計	100.0

資料來源：同上書，p. 160-161。

由上列三表，可以清楚地看到，接觸西方文化較早，而經濟開發程度較高，教育文化較發達的沿海、沿江各省，留學生人數比較衆多。因為這些地區的省政府及家庭均有足夠的財力遣送子弟出國留學。

從留學生家庭職業分析，也以商人、政府官員、教職員、工業家庭爲最多，農村地主最少。下面是 1924 年調查清華留美學生 389 人家庭出身的情形：

表八 清華留美官費生家長職業統計(1924)

職 別	學 生 百 分 比
公 務 員	32
教 職 員	31
工 業 家	30
律 師 及 其 他	13
農 家	4

資料來源：同上書，p. 154。

上項統計沒有提到商人，可能包括在工業家之內，或者商人較有資力，不須依賴官費。

何以說自費留學生非出身富裕之家庭呢？據 1914～1924 年教育部所規定的官費留學生學費標準，除往返川資、治裝費及醫藥補助等費外，每年學費及生活費用，留日生需 500～1,000 元，留歐需 2,000 元，留美需 2,000～2,640〔舒新城，1927：139-149；Wang, 1966：153〕。依照此一標準，自費生即令再節省，也需籌足 500～1,500 元不可。據 1918～1927 年間經教育部登記出國的自費生 890 人中，其留學期間所預定的經費，或因國別、時間長短及家庭環境而異，但最少需預籌 1,000 元，最多達 30,000 元。而此項保證金額，多由在政府各部門任高級職位的親戚、同鄉、世誼及父親等人擔保。〔王煥琛，1970：v3, 1571-1659〕換言之，若無較好的家庭出身，或與上層社會有較佳的關係，自費留學是非常困難

的。勤工儉學留法生的遭遇，是最好的證明。

## (二) 知識份子之分佈

在傳統社會裡，中國之士紳尚能較平均地分佈于城鄉之間，即所謂「出為仕宦，退隱鄉里」，因鄉村為士紳階層的經濟與社會基礎。但民國成立以後，由於政治、經濟與教育的發展偏重城市，而兵禍連年，鄉村非安全之地，城市遂成為富人及知識份子所追求的生存空間。

中等以上學校及學術文化機關，為容納知識份子的主要場所，而這些機關，都比較集中于大城市。以大專學校為例，自清末起，一直局限於首都北京及各省會商埠。民國成立後，尤其是1922年改仿美國學制以後，愈益集中於上海與北京二地。1931年時，全國大專院校103所的地區分佈，江蘇（實際上海）佔26%，河北（實際北平）佔22%，廣州佔8%，其餘都在6%以下。（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1934：丁41-58）故大專學生自然也比較集中于少數大城市之中。

學術研究機關的分佈也然。自清末到1927年，共設文法理工等研究機構34所處，也都集中于上海、北京二地。（全上，1934：丁72）在這些機關工作者最少也有數百人至一千人。

至返國的留學生，因已習慣于城市生活，且在外國所學，以工商、法政、教育、醫藥等學居多，〔林子勛，1976：399-401〕故不入政界，即入學界，勢非在城市謀職不可。即令因抗議外交事件而返國的，也都集中于城市。如1918年時留日學生共約萬人以上，此年5～7月間，因反對北洋政府與日本寺內內閣的軍事秘約，約有三千人返國，分散于北京、上海、天津各地，其中有一大部份人「分別插入北京各大學，成為民八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動份子」。〔李璜，1978：26〕

總之，城市已成為中產階級及知識份子所追求的生存空間，他們或到城市讀書，或在教育文化學術機關任職，充當教職員、報社書局編輯、律師、醫生，或寧願失業于大城市，投靠親友，或賣文為生；即令學非所用，也願委曲求全。〔陶希聖

， 1930：482-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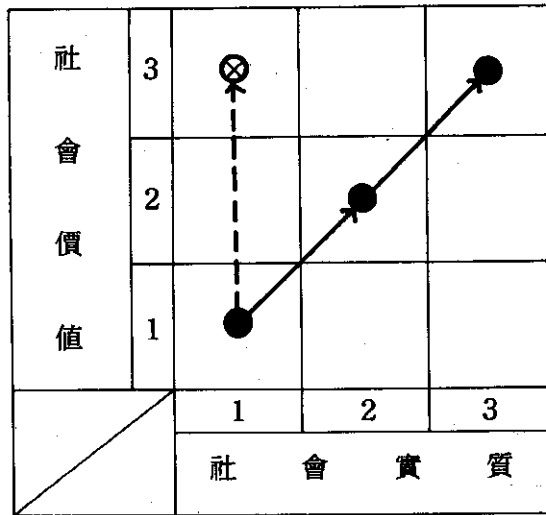
於介紹知識份子結構變遷之後，我們發現幾點事實：(一)人數雖愈來愈多，但仍舊是一個比較封閉的階層。(二)知識份子的教育結構重心，由舊學偏向新學，這是教育現代化的結果。(三)知識份子領導群的年齡，愈來愈輕，思想也較偏激。(四)知識份子均集中於城市。下面就討論他們的價值觀念問題。

#### 四、價值觀念之迅速變遷

社會價值與社會實質有一定的關係，當社會實質改變時，社會上層結構(Social superstructure)之意識型態與價值觀念也隨之改變。〔宋明順，1974:63-64〕近代以來之社會特質，依工業化標準可分為農業社會，或前工業社會(Pre-industrial society)、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與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三種。農業社會強調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故知識份子重視人倫的價值。工業社會強調經濟和利益衝突，在此社會中之知識份子較易產生物質主義價值取向(Materialist value orientation)，為尋求經濟平等，寧願接受相當的組織約束。後工業社會中，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識份子，則厭惡傳統科層制度，強調參與及自由，採取超物質主義價值取向(Post-materialist value orientation)。〔黃瑞祺譯，1981：189-191〕當然社會價值也會對社會實質發生影響。不過這種互動的關係，必須保持適度的均衡，也即必須保持全社會的穩定發展。假若社會價值取向超越這個均衡點，便發生社會緊張與不安現象。超越愈遠，社會緊張與不安愈甚，這種現象，社會學者就稱之為「時空錯置」(Anachronistic)反應，也即本文所稱的超前反應。

回顧中國的社會實質，在民國初年以前，尚屬農業社會，或前工業社會階段。但知識份子群中的少數先驅人物，由於受到異質文化強烈刺激，而發生超前的反應。從清末之自強運動(求軍事技術之革新)、維新運動(制度之革新)、立憲運動、革命運動，到民初之五四運動(要求自由、民主與科學)，步步高升。除自強運

動較具物質主義取向外，其餘四種運動，均具超物質主義之價值取向。也就是說，他們生存在一個比較貧乏的農業社會裡，但却心懷後工業社會的崇高價值觀念——自由與參與，如下圖所示：



- 說明：(1)阿拉伯數字代表社會實質與價值的不同對應階段。  
(2)●點為二者的均衡對應關係，諸黑點所構成的直線，實即社會實質與社會價值的均衡線。  
(3)⊗為民初知識份子的超前反應。

在此必須表明，著者也是民主與自由的追求者，因此沒有理由說這種崇高的價值取向不好，或對中國社會沒有積極的作用。而是說由于這種理想與當時現實的尖銳矛盾與衝突，不容易實現，才造成民初政治、文教、學術等方面的種種問題。到頭來，理想還是理想，現實仍是現實。到底這些新價值觀念所產生的歷史意義是什麼？應從民初知識份子社會功能與角色中去探討，才能明白。

## 五、功能與角色之評估

關於民初知識份子的社會功能與角色，迄無定論。大部份歷史學家及五四的參

與者從消極的觀點否定他們的貢獻，但也有一部份人從積極的立場肯定他們的成就。

比較肯定民初知識份子貢獻的史學家，應以周策縱為代表。他的「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一書，是最具影響力的一本著作。周氏於評價「五四運動」的功過時說，「五四運動」是由知識份子所領導。「五四」的成放在意識型態的改變，也就是打破傳統禮教束縛，追求個人自由，以理性主義、懷疑精神的科學態度，重估傳統文化，求中國之獨立自主與現代化之實現。雖然彼等於理性與邏輯方面「說得多，做得少」，但是「這種變化實在令人驚奇。傳統的一切皆已動搖，甚或蕩然無存，新起的正方興未艾；而文人的胸襟與眼光也愈來愈加廣濶。」〔1979：223-224〕總而言之，『「五四」在中國學術、社會和政治上的影響持續甚久，而其思想亦根深蒂固，不易動搖』。但周氏也提到「五四」的缺點，如批評傳統時「缺乏公平正確的態度」，「犯上幼稚、混亂及輕視的毛病」。另外，於介紹新思潮時，缺乏行動，「大談主義而不論其適用與否，因之在吸收與排斥之間，引起了混亂的狀況，無法理出清晰的思路」。不過，周氏又說，這都是在變局裡常有的通病。〔1980：236-237〕換言之，他肯定他們的破舊成就，而原諒他們的幼稚與無知。

比周策縱還要積極的是張玉法。他的「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民國六十六年)一書也受到國內史學界的熱烈歡迎。他將五四運動界定為「啓蒙運動」。他說，發生於1915～1923年的此一運動，係由「新知識份子」和「新興工商界人士」所領導。始則「起於自由學風的建立和新思想的傳佈」，終則帶動「教育、學術、思想、政治及社會的變動」，「是國家新精神的孕育和誕生。」張玉法幾乎沒提到此一運動的負功能。他又說，此一運動基礎廣濶，強勁有效，影響廣泛深遠。因此，它的「價值是肯定的，決非否定的。」〔1977：334-336〕

事實上，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結構，如前所述，非常複雜，程度也參差不齊，所涉及的教育文化團體也很多，實在不能以北京大學一校及蔡元培、胡適、陳獨秀

等少數人爲代表，而誇大了他們的功能與角色，何況蔡是位理想主義者，胡也有可以訾議之處〔唐德剛，1979：17-27〕，陳更不用說。

要正確評估此一時期的知識份子之表現，似應分別從政治、教育、學術、文化思想等方面逐項檢討。

政治方面，知識份子的功能最好在輿論批評與制衡，而非直接參與。而當時北洋政府之權力結構，主要由1880年代以前出生的新式文武官僚及工商職業團體所支配。〔Nathan, 1976：13-15〕1890年代以後出生者，除少數外，多被拒于此一政治權力核心之外。在失望之餘，乃各就所知，介紹鼓吹西洋政治思潮，諸如自由主義、民主主義、虛無主義、社會主義等，擴大了一般知識青年的政治思想領域，並使之捲入各種政治集團之中，互相鬥爭，如北大於1925～1926年間，有國民黨左派、國民黨右派與青年黨的組織，各自向外發展。彼此之間，或聯合，或對抗，不一而足，並發動街頭示威，攻擊政府。在上海、武漢、成都、重慶等處，也發生同樣的情形，最後是左派得勢。〔李璜，1978：124-8, 142-6〕故民初知識份子在政治上之正功能，爲抑阻北洋政府之喪權辱國外交，醜化北洋官僚體系，爲南方之國民革命敷路。但其負功能，則在製造政治思想之分裂與對立，偏向激情與輕浮，好高騖遠，不切實際。與原先所標揭之民主政治理想，正背道而馳。

教育方面，質與量均比清季進步，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在師生關係方面，則令人失望，這一點祇要我們檢討中等以上學校的教師、學生及留學生的心態與作爲即可明白。此時之教育經費很少，設備很差，而政治、軍事對教育的破壞力量也很大，這是衆所周知的事實。但如果能保持學校內部的和諧團結，教育質量之再提升，是可能的。不幸「五四」的浪潮，不僅動搖了儒家傳統，也深深地破壞了國家的教育基礎。我們只要翻開東方雜誌及教育雜誌，隨處發現時人的批評，1914年時，賈豐臻就指出，「平等自由之學說」，「破除階級，打勝取締之論調」，已搖撼一般血氣未定之少年子弟，而呼籲彼等歛才就範，遵守校規。〔教育雜誌，1914：5：11〕然而翌年校園仍發生師生對立衝突之事，他又說，



「師弟鬪牆，風潮迭起，一芥之微，幻成千駟，以學校為戰地，視職員如寇讎；其次者，傲慢成風，不知愛敬之道。」〔教育雜誌，1915:7:2〕

此種風氣，經過「五四運動」的強化，益加嚴重。另一位教育界人士分別於1920及1921年提出了批評。他說，在教育行政方面，敷衍主義流行，主事者消極處事，只希望不鬧學潮，不罷課，不反對校長，維持現狀即可。在學校內，尤其在中學裡，學生「挾五四風氣」，「浮驕好動」，鬧風潮，校長威嚴掃地，教職員信用破產，師生互相猜疑，前途堪憂。他又分別批評國內一般學生及回國留學生的思想行為。他說，國內學生，偏激盲從的人多，理性的少。西洋回國留學生不下四千人，除少數外，多學非所用，且生活靡爛，休妻重婚，賭麻雀，鑽營公門者有之。東洋留學生前後萬人，回來者也四千人，程度差，又不認真求學。〔教育雜誌，1920:12:2；1921:13:3〕他的批評也許過份了些，但也道出許多實情。李璜也說，五四時突出的一代知識份子，多數只有二十餘歲（按即前述1890年代出生的一代），新知根底淺薄，然而一知半解後，便敢說、敢寫、敢幹、勇往直前，發生衝擊力。〔1978:22〕此種思想行為與風氣，用之於政治社會運動尚可，用之於提高教育與學術品質，則南轅而北轍了。據常道直的研究，僅1922年，全國16省份就發生學潮106次之多。就地區論，以江蘇、浙江與北京為多。而發生於中等學校者佔67%，大專學校佔23%，小學佔10%。〔教育雜誌，1923:15:4〕足見中等以上學校風氣之敗壞，何等嚴重！？尤其是教育發達的地區。

在文學方面，民初知識份子的重要貢獻在提倡白話文學，領導者除少數1880年代以前出生的陳獨秀、夏丏尊、周樹人（魯迅）、劉大白等人外，餘多為1890年代出生的一夥，如胡適、郭沫若、沈雁冰（茅盾）、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等人。前面提到，這夥人的特點是沒有傳統功名，而受較好的新式教育，擁有較新的思想。於是他們不滿意舊文學的形式及內容，要求改革，倡用國語的、人性的、寫實的及社會的文學，於京滬等城市發生很大的影響。就文學本身論，此一運動確有一些實質的成績。然一開始即與政治發生關係，初以愛國情緒反對北洋軍閥，續于

1926年高唱「革命文學」，滲入更多的政治因素，將愛國與反政府混為一談。及左派作家聯盟于1930年成立後，更不可收拾。〔周錦，1977：5-17，113-8，321-33；夏志清，1969：33-57〕總之，新文學作家有很充沛的自由意志與創作精神，但多偏向激情，結果所扮演的「却大半是悲劇的角色」。〔陳映襄，1977：趙序1-2〕

在學術思想界方面，傅斯年於1918年指出其根本謬誤。這時傅氏才22歲。他的批評對象似以舊派學者為主，但何曾不包括新派學者在內。他說這時學術界的根本謬誤在：(一)重師承關係，而非重學術之融通性，以人為主，故人亡學息。(二)否認個性之存在，以依附古聖先賢為天職。(三)不知因時應變。(四)不知分工原則。(五)好談致用，然多喜浮誇，而一無所用。(六)無治學之工具，如邏輯學。(七)重形式而輕實際與精神。因之民初多數學者，似通非通，自以為是。欲收容西洋學術思想以為我用，談何容易。〔1980：1213-1223〕雖然美國政治學家白魯恂(Lucian W. Pye)說北洋政府時代，學術是向知識份子開放的。〔1971：Chapter 9〕但是這時的研究環境非常惡劣。不但研究機構少，經費、設備與人才也都缺乏。自清末到1927年，全國僅設立34所研究機構。其中文、法、教育佔22所，理工農醫僅12所。〔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丁74〕全部研究人員不過千百位。除了丁文江所領導的地質調查所(1916)，確是培養了一些人才，並作出具體的成績，成為世界知名的「純粹科學中心」，〔胡適，1956：27-32〕李濟、陳達在清華學校教學，並開始從事考古及社會調查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橋川時雄編纂，1940：459〕及教育學界，從事於一些教育理論的研究與實驗，也有一些成績外，一般而論，徒具科學之名，而無科學之實。與傅斯年的立場相反，梁啟超於整理清代曆算學及其他科學後，對民初學術界之新派也有微詞。他說：「若今日之揭科學旗幟以嚇人者，加減乘除之未爛，普通生理心理之未學，惟開口罵『綫袋書』，閉口笑『玄學鬼』，狃狃於通衢，以自鳴得意。顧亭林有言，『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吾得易其語曰，『今之清談談科學』。夫科學而至於為清談之具，則中國乃真自

絕於科學矣，此余之所以惘惘而悲也。」〔1936：356〕總而言之，在此「科學萬歲」的年代裡，能夠作到傅斯年所期求，殷海光說中國歷史文化裡所欠缺的「為知識而知識」的人，實在太少。相反的，驕傲、偏激、輕浮的風氣，籠罩著整個社會。〔杜維運，1981：5-9〕徐復觀也認為，問題出在其所標榜之「偏激的文化精神」與他們自己所提出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在本質上不能相容」。〔徐復觀等，1980：77-78〕唐德剛與葉啟政從社會發展史的觀點，則認為五四時代的知識份子忽略了思想的時空性，強將西方工業社會十八世紀以來發展出來的「自由」、「平等」和「科學」的價值取向，在中國鼓吹，而沒有深入分析這些基本精神的歷史背景及其可行的條件，並從中國的歷史經驗中找出一新的東方法則來。在這種「浪漫氣息」下，即令政治環境安定，也未必能使中國科學生根，學術起飛。〔唐德剛，1979：22-26；徐復觀等，1980：377-384〕唐、葉二氏的批評，均闡釋了前述社會價值與社會實質的對應關係。民初知識份子的學習能力極強，但是却錯置了這種對應關係。

## 六、結 論

總之，民初是知識份子「震撼」、「覺醒」與「自我解放」的時代。在政治上，他們羞辱了北洋政府，並動搖其統治基礎，但無法使新舊統治階級接受民主理念。對帝國主義的批評與抗議，使鬱積的國民情緒，獲得宣泄，但未能使帝國主義者心驚膽寒。他們於文學上的革命，有比較豐碩的成果，在科學與學術上也有一些成績。這是知識份子聲譽隆盛的時代，也是知識份子命運坎坷的時代。其所以如此，係基于下列原因：(一)中國當時的社會，是屬於工業前社會，其物質基礎及教育水平，均不足以容納這麼崇高的「自由」、「平等」與「科學」理想。(二)中國遭受空前的強權蹂躪，激起了強烈的民族意識。此種意識很容易轉向情緒性之發展，而產生激情主義與浪漫色彩。且以強勁的姿態籠罩整個社會。在這種情境下，很難孕育出理性主義及踏實的科學精神。(三)如前所述，中國經濟基礎薄弱，而教育則較清末有

快速的膨脹。教育內涵又沒認真指向社會經濟需要，於是，所造成的「人才」，多未能為社會經濟及服務部門所容納。失業、挫折與不滿情緒遂乃產生，正等待機會發泄。(四)由于思想上的解放，西方思想文化加速輸入，而產生大批具有邊際人性格的知識份子，他們當然也扮演創新與改革的功能，但由于一部份人錯置時空，擴大了「現實」與「理想」的距離，益加對現狀不滿。當然，也有少數人保持冷靜，從事根本的研究，或走向農村作實際的調查研究與實驗，這應該是中國現代化的真正「因子」，不幸他們的工作或被同輩譏評，或被政治權力中心懷疑，而未能生根發芽。

民初的知識份子並沒有完成使命。那麼，中國今後的現代化須要怎樣的知識份子呢？金耀基提供了一個模型。他說必須重新培育出「一個新的建構化的知識階層」。以現代的情形言，這個新階層之結構應包括(一)大學教授及學生，(二)學術機構(包括人文、社會、自然科學)之研究人員，(三)新聞系統工作者，(四)獨立從事思想、文化工作者。他強調，這個新知識階層必須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而不是一個排他性的特權階級。他們不以身份、權力為基礎，而以知識、成就為基礎，是一個以獨立、自主為發展目標的知識團體。有了此一團體，才可對政治、經濟、宗教與軍事等集團構成制衡的力量，對國家社會問題提供真正智慧的意見。金氏又期待這個階層的分份子必須冷靜、忠于知識與良心，能遵守民主理則，參與而不壟斷，且能與政治權力中心保持互惠而非敵對的關係。至於國家與社會，則應保持關懷與期待。〔徐復觀等，1980：417-422〕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經濟教育基礎而言，金耀基的模型，應不是一個架空的理想。我們當然不能以此理想去權衡民初的知識份子階層。但是，我們若不以此期待今後的知識份子，則中國的現代化之持續進步，將會發生困難。

## 註 釋

〔註 一〕本文對知識份子一詞的定義，係根據下列各家之說，而加以綜合解說者：

- (1) Wang, Y. C. 1966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 vii.
- (2)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1954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 (3) 徐復觀，「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的命運」，在徐復觀，1980，知識份子與中國，頁201-220，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4) 殷海光，「知識份子的責任」，見徐復觀等著，1980 知識份子與中國，頁121-160，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5) 葉啟政，「從文化觀點談知識份子」，見如上書，頁23-36。
- (6) 金耀基，1968，「中國新知識階層的建立與使命」，見如上書，頁417-422。
- (7) 宋明順，1974，「現代社會與社會心理」，頁258-260，台北：中正書局。
- (8) 周谷城，1930，「知識份子及過剩人口問題」，見陶希聖編，1930，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頁439-440，上海：新生命書局。

## 參考書目

王湘雲

1981 科夥分析與理論之建立。民族所主辦社會學討論會。

多賀秋太郎

1976 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台北：文海出版。

宋明順

1974 現代社會與社會心理。台北：中正書局。

沙發諾夫

1932 中國社會發展史。上海：新生命書局。

李 璜

1978 學鈍室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社。

杜維運

1981 民國以來的學風。台北：建國史討論會論文。

帕深思等，黃瑞祺譯

1981 現代社會學結構功能論選讀。台北：巨流出版社。

周策縱等

1979 五四與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公司。

周 錦

1977 中國新文學史。台北：長歌出版社。

林子助

1976 中國留學教育史。陽明山：華岡出版社。

胡 適

1956 丁文江的傳記。南港：胡適紀念館。

徐復觀等

1980 知識份子與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公司。

唐德剛

1979 胡適雜憶。台北：傳記文學社出版。

梁啓超

1936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中華書局。

陳映襄

1977 民國文人。台南：長河出版社。

陶希聖編

1930 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上海：新生命書局。

夏志清

1979 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社，譯本。

教育雜誌社

1909-1928 教育雜誌。上海：商務印書館。

國民政府

1935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來主要事業之進步。南京：中正書局。

張玉法

1977 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

傅斯年

1918 「中國學術思想界之根本誤謬」，見傅斯年全集，冊4，頁1213。

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

1928 北平：北平社會調查部。

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

1934 台北：傳記文學社影印。

橋川時雄

1940 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北京：中華法令編印館。

Chou, tse-tsung

1960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ow, Yung-teh

1966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N. Y.: Athertor Press.

Nathan, Andrew J.

1976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ye, Lucian W.

1971 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 Y.: Praeger.

Wang, Y. C.

1966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